

当代西方社会学中自然主义 与反自然主义之论争^{*}

[美] 艾德里安 C·海斯

编者按：这篇文章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社会学系教授艾德里安 C·海斯先生应约专为本刊撰写而成。作者以通俗的语言和流畅的笔调为读者展示了当代西方社会学中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之论争的全貌。文章立意新颖、别具一格，于中国同行不无启示。

绝大多数西方社会学家认为：科学知识应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但是，经验事实本身并不能构成科学理论和知识；抽象概念和一般理论是科学发展中必不可少的，而且，这种抽象概念和一般理论并不能简单地从经验事实或数据中归纳出来。在现代社会科学中，坚持严格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人已经越来越少。然而，究竟什么是理论？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关系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社会科学家们存在着严重分歧，并围绕着这些分歧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在论争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两个互相对立的派别。为了方便起见，在本文中我称这两个对立的基本派别为自然主义流派和反自然主义流派。本文的目的在于：首先，从历史演变的角度、从众说纷纭的观点中理出这场历时长久的论争的焦点和基本框架；接着，我要着重分析当代西方社会学家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争论。我希望本文能引起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兴趣。

一、社会学历史中的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观点

西方社会学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论争的某些特征至少可以追溯到那个时候。启蒙运动在社会学理论中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实证主义潮流，正是这股实证主义潮流奠定了本世纪初期社会学在西方一些大学中的学术地位的基础，这股实证主义潮流以大家熟悉的孔多塞（M. J. Condorcet, 1743-1794）、圣西门（C. H. Saint-Simon, 1760—1825）、孔德（A. Comte, 1798—1857）、斯宾塞（H. Spencer, 1820—1903）和迪尔凯姆（E. Durkheim, 1858—1917）为代表。实证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与人类行为是自然界的继续并且组成自然界的一部分；在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中也存在着和自然界一样的规律；因而，对于这些规律也可以使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方法来研究。他们在经验研究中奉行方法一元论的准则。这就是本文中我称之为自然主义流派的基本观点。与这一传统相对立的是诸如黑格尔（F. Hegel, 1770—1831）和狄尔泰（W. Dilthey, 1833-1911）等人。他们认为人类行为的显著特征在于它创造和表达“意义”（meaning），这一特征使自然科学中的因果律不

* 此为本刊专稿。作者特别指出：“在这里我要感谢我在南开大学的朋友和学生，正是和他们的热烈讨论促使我萌发撰文参与中国学者讨论的念头；这其中要特别提到的是欧阳马田先生的工作。”

能有效和恰当地把握和揭示社会生活的特性。由此出发,他们认为有关人类社会的科学的方法必须与自然科学的方法明确地区分开来。换句话说,他们提倡“解释学的”方法(hermeneutic)或曰反自然主义的方法(怀特, Wright, 1971)。

西方社会学的发展总是伴随着这两种传统之间的持续对立和时断时续的论争。19世纪中叶,在进化论实证主义的影响下,这种自然主义的研究传统统治了整个欧洲,尤其是统治了法国和英国。19世纪后期,从德国理想主义哲学(German idealist philosophy)中产生出来的反自然主义和反实证主义运动开始异军突起。众所周知,韦伯(M. Weber, 1864—1920)就受到了这种理想主义哲学的强烈影响,他因此还试图在实证主义和理想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划出一段“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在本世纪20和30年代,我们同样看到实证主义及其方法一元论在美国占着统治地位。尽管这种地位受到帕森斯(T. Parsons, 1902—1979)的著名的《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的明显挑战,但很显然,这还不足以影响它的统治地位。在过去的40年中,一方面我们看到统计分析的威力、影响和地位在不断增长,以致于10年或20年前的美国社会理论面对强大的统计分析只好焦虑不安地站在一旁;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反自然主义的所谓“批判理论分析者”和现象学分析家。今天,正如我们马上就要分析的那样,这场论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应该指出,我所陈述的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方法之对立带有一定的抽象性质,不同的理论家会程度不同地趋向于其中的一体。此外,事实上,在过去的200年间也有许多西方理论家在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的论争中持骑墙态度。因而,在他们的理论中既有自然主义方法的痕迹,也有反自然主义方法的因素。例如,韦伯把社会学定义为“一门理解社会行动从而解释社会行动的原因和结果的科学”(韦伯, Weber, 1968: 4)。许多人认为马克思也同时对这两种方法感兴趣。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家(他们强调意志论——Voluntarism)和结构主义或科学马克思主义(他们强调自然主义的决定论)二者都宣称他们是马克思的合法继承者(古登纳, A. Gouldner, 1980)。弗洛伊德(S. Freud)是另一个试图结合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方法的创造性理论家的典范。

尽管有这么多同时采用因果阐释方法(基于自然主义的观点)和解释学方法(基于反自然主义的观点)的成功尝试,但至今,我们并没有满意地实现这两种方法的整合或综合(马特儿和海斯, Marterl and Hayes, 1979)。帕森斯曾自始至终地一贯强调从行动者的立场理解行动的意义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他又认为要达到类似于自然科学中因果律阐释的那种目标(帕森斯与希尔斯, Parsons and Shils, 1951)。但是,从技术上看,这一理解的方面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帕森斯的最有希望的一张牌是他的有名的模式——变量框架,但是,这实际上也只不过是分析者为了用抽象的变量(specificity-diffuseness, universalism-particularism等)来对文化的意义进行分类和整理而提出的一套分类框架而已。与此同时,尽管他的系统理论在原理上与因果分析相吻合,但是,他的有关功能分析的一些判断又经常模糊和掩盖了这一事实。换句话说,帕森斯有关行动的一般理论同时使用了解释学方法和因果分析方法,但是,他并没有为这两种方法的整合提供清晰的指导方针或原则。上述事实表明:尽管西方理论家们一次又一次地试图超越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的鸿沟而寻找存在于二者之间的坚实的“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但是,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之间的对立还是没有消除,二者之间的整合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二、20世纪50年代的正统共识 (orthodox consensus)

要理解今天的这场论争,就必须理解本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流行于西方社会学家之间的基本观点,吉登斯(A.Giddens)把这种流行的基本观点描述为“正统共识”(吉登斯,Giddens,1979:235-238)。首先,在本世纪50和60年代存在着一个广泛的发展“工业社会理论”的兴趣,这种兴趣建立在对“传统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比较上,并且把这种从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的转化视为一个遵循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的演变过程。不论是美国的帕森斯、丹尼尔·贝尔(D.Bell)、克拉克·克尔(C.Kerr)和利普塞特(S.M.Lipset),还是欧洲的阿隆(R.Aron)和达伦多夫(R.Dahrendorf),他们都持有一个共同观点,那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同属于工业化社会。工业化的初期以政治意识形态和阶级冲突为标志,当工业化社会进入它的发达和成熟阶段时政治意识形态和阶级冲突演化的可能性就减少了。有意思的是,正当这种理论已经失去了它的权威地位时,一些大众作者如托夫勒(A.Toffler,1984)和奈斯比特(J.Naisbett,1988),却仍然将他们的许多观点建立在这种工业化社会理论的一些天真假设上。遗憾的是,在这里我不能用很多篇幅来专门讨论这些问题。

其次,在理论分析上,“正统共识”倾向于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整个这一分支被统称为“结构—功能主义”。其基本原理就是试图通过指出制度对社会整体或对其它社会结构的功能来解释该社会制度的结构和文化内容。功能分析是帕森斯所有研究工作的中心。后来,罗伯特·默顿(R.K.Merton,1949)试图摒弃传统功能主义的一些有问题的基本假设而力图使功能主义更适合于对经验事实的分析。

“正统共识”的第三个特征是它完全建立在自然主义尤其是自然主义之方法一元论的基础上。无论是关于理论的结构、研究的方法论,还是解释的逻辑,“正统共识”都深受现代实证主义哲学家如卡尔·亨普尔(K.Hempel)、内格尔(E.Nagel)、阿伯纳罕·卡普兰(A.Kaplan)以及卡尔·波普尔(K.Popper)的影响(卡尔·波普尔本人经常反对别人称他为实证主义者)。总之,在这一时期(本世纪50年代)英语国家中的绝大多数社会学家都把他们的目标放在发展一种自然主义的有关社会的科学上,而且,他们相信他们一定能达到这一目标。

正如吉登斯指出的,“正统共识”在其基本观点上形成这三个特征不足为怪。这三个特征的自然联盟至少可以追溯到圣·西门。令人惊奇的倒是它的广泛影响发生在社会学经历着空前发展的时候。这种“正统共识”也并不是没有受到挑战——例如,从乔治·哈伯特·米德(G.H.Mead)那儿发展起来的符号互动论以及芝加哥学派就被称为“忠实的反对派”。但是,“正统共识”奠定了那个时候社会学学术研究的基本方向,而且引进了许多过去存在争议而且现在还在争议的学术名词。

默顿把理论定义为“逻辑上互相关联的一系列命题,从这些命题中可以推出经验规则”(默顿,Merton,1967:39)。默顿认为对社会学理论系统的严格分析不能混同于对它的历史记录(1967:1—3);许多被标定为理论的东西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来说并不构成理论(1967:139—147)。同样重要的是,他关于理论的定义吸收了哲学上对普遍规律(universal law)和经验概括(empirical generalization)的区分(1967:149—150):理论严格说来并不是一组用来描述经验规则(empirical uniformities)的命题(象开普勒用来描述行星围绕太阳运行的轨道一样的经验规则),而是一组逻辑上互相关联的普遍涵盖的并且由它可以推出经验

规则的一组命题（例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从万有引力定律中事实上可以推出开普勒的所谓“规律”）。默顿对理论的定义表明他倾向于自然主义方法，力图发现普遍规律，而把观察到的规则视作普遍规律的特殊情况。

哲学家亨普尔给了我们一个简明的事例来说明什么是“科学解释”。设想一个杯子，里面装满了水，水面上漂浮着冰块。当冰块溶解时，杯里的水将溢出杯口吗？如果我们做这一个实验，就可以发现不会从杯口溢出水来。那么，我们应怎样科学地解释这一现象呢？阿基米德原理告诉我们：放入水中之物体的重量等于因放入这一物体而溢出来的水的重量。因此，我们可以用溢出来的水的重量来衡量放入水中之物体的重量。因为冰块是漂浮着的，因此，冰块溶解成水的重量恰好等于它尚未溶解时的重量。所以，它溶解成水后的体积恰好等于它溶解前的体积。因此，当冰块溶解时，水既不会因增加而溢出，也不会因减少而降低其在杯中的位置。

亨普尔用这一个例子来说明他所理解的科学解释之逻辑结构。我们可以说阿基米德原理“解释”了杯中水位保持原样这一现象。因为，当我们连接阿基米德原理（大前提——译者注）和对这一实验条件的描述（小前提——译者注）时就已经发现这两个大小前提逻辑地蕴涵了推论——水位保持原样。“更确切的说，被解释的现象是逻辑地从前提中推导出来的”（亨普尔，Hempel, 1959:273）。这就是我们通常称之为所谓的“涵盖律解释模型”（“covering law model of explanation”）。

这种把理论视为一组命题，其中一些命题应该是类似于普遍规律，以及把解释视为一种从普遍规律推出特殊事物的过程的观点被50年代和60年代的许多社会学家视为一种追求的理想和目标。那时候大多数关于理论和方法论的讨论都集中于如何在社会学实际研究中实现这一理想目标。从而，在当时出现了使社会学理论“命题化”（如霍曼斯，Homans, 1950, 1961；斯廷奇孔伯，Stinchcombe, 1968；泽特伯格，Zetterberg, 1954）及尽量使理论形式化和数学化（如布莱洛克，Blalock, 1969；科尔曼，Coleman, 1964等）的趋势。然而，当亨普尔运用他自己的哲学标准于功能分析时，发现它缺乏解释力（亨普尔，Hempel, 1959）。但是，还是有许多理论家开始维护功能主义并且重新设计它的理论结构从而使功能主义越来越接近于逻辑上的理想模型（如斯梅尔塞，Smelser, 1968）。

甚至默顿和帕森斯之间那场有名的关于中程理论和一般宏观理论之争论也更多地是讨论达到“正统共识”的理想目标的策略，而不是讨论理论的性质和适合于社会学家的解释模型本身（伯恩斯坦，Bernstein, 1978:16—17）。默顿抱怨道：

“一些社会学家还在撰写和致力于形成宏大的囊括社会行为、组织和变迁的社会学理论，而且力图用这种理论来指导对经验问题的具体研究。我认为这是一种幼稚的做法。我们还尚未达到这一步。许许多多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默顿，Merton, 1967:45）。

默顿强调系统的社会学理论，他认为理论本身并不能理解为由一些解释经验数据的一般思想导向构成。^①然而，帕森斯则把这种一般的思想导向视为分析问题和形成假设所必不可少东西。但是，他们双方都认为：最终，大部分经验研究中的操作假设都是直接从一套一般理论系统中得来（帕森斯，Parsons, 1950, 引自伯恩斯坦，Bernstein, 1978:17）。他们双方都认为最终目的是形成这样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包含着互相关联的命题，从这些互相关联的命题中可以解释经验事实和规则。

^① 默顿认为这种一般思想导向只不过是提出了必须加以分析的变量类型而已，它并没有提供清晰的可以验证的关于一些具体变量之间的关系的假设。

三、“正统共识”的瓦解

在本世纪60年代晚期，英语国家中社会学的这种“正统共识”瓦解了。原因有好多，其中包括许多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本·戴维，Ben-David, 1973）。但其瓦解的根本原因还是来自它的内部：即尽管有数千社会学家的努力，但终究还是没有产生出符合自然主义社会学的标准的命题式的理论和科学解释。经验研究者们发现了许许多多的经验规则，但是，没有一个是称得上真正地符合实证主义哲学家描述的标准的社会学的规律。^①

自然主义社会科学家们面对这种难堪的局面，不得不修改他们关于命题式理论的定义。例如，林南在他的卓越的教科书中写道：

“在这里，理论是指一组互相关联的命题，其中一些命题可以用经验来验证。因此，理论有三个重要特征：1.它包括一组命题；2.这些命题互相关联；3.其中一些命题是可以验证的。”（林南，Lin Nan, 1976:17）。

从默顿的理论定义“逻辑上互相关联的几组命题，从中可以推论出经验规则”到林南的理论定义“一组互相关联的命题，其中一些可以验证”，初看起来，似乎差异很小，实际上却存在着巨大差异。因为默顿的定义包涵了对经验规则与普遍因果律的区分，而林南的定义实际上放弃了这一点。

社会学中缺少严格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命题，也许它只是改变了人们观察问题的角度和修改一下理论的定义而已。这种修正已经被绝大多数崇尚自然主义科学的社会学家所接受。这种修正了的自然主义理论定义，使得在“正统共识”下发展起来的许多经验研究得以继续：因为它鼓励通过以经验规则为形式的经验研究的累积而达到社会学知识的增长，它也允许在此基础上发展更为抽象的命题。

然而，修正强论的定义这种方法仍然缺少科学的论证，而且，修正了的定义也不能掩盖自然主义方法的基本矛盾。确实，19世纪的一些实证主义者忽视了规律与经验概括的差异（例如孔德就因此而受到了米尔（J.S.Mill）的严厉批判，1961）。进入20世纪后，一些理论家认为这种区分没有多大意义。但是，最近大多数很有影响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却仍然强调规律与经验概括的区别，他们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说明了这种区分的重要性。他们指出了自然科学是如何成功地建立在因果式命题而不是经验概括的基础上的。应该看到在象开普勒对行星做椭圆运动的描述与“所有乌鸦都是黑的”的经验判断之间也存在着差异。一个没有反映这种差异的理论定义不可能提供分辨一个事件究竟是理论上相关的还是仅仅是个偶发事件的标准。类似于“所有乌鸦都是黑的”这种概括可以十分有趣，但它们仅仅只是科学知识中最肤浅的那一部分。

此外，对于那些一方面提倡自然主义社会学，另一方面又放弃对普遍规律与经验概括的区别的人来说，他们无疑使自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自然主义的代表人物拼命坚持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不存在差异而鼓吹方法一元论；但是，当他们谈论社会科学时，他们又放弃了普遍规律与经验概括的区别。这就意味着他们事实上还是承认了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然而，这一矛盾并没有宣判社会学中自然主义流派的死刑，自然主义方法的崇尚者可以有大量的证据来说明他们的立场并非自相矛盾。

^① 有不少社会学家时常宣称他们发现了社会学规律，但是细究起来，他们的发现并不是这种严格意义上的规律。波普尔就说明了为什么很多被称为历史规律的东西并不是完全科学意义上的规律，而不过是对一些经验规则的抽象描述。就是说，它们是经验概括，但不是真正的规律（波普尔，Popper, 1975）。

四、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

“正统共识”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的瓦解伴随着其它许多形形色色西方社会理论的萌芽和产生。这些新产生的理论有：法国结构主义、德国批判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不同形式的现象学说以及符号互动论等。这些不同的理论学派或范式之间通常缺少建设性的沟通，因此，理论的发展表现为各自为政并且具有非累积性的特征。“多元范式”常常用来形容这种状况（李茨，Ritzer,1975）。^①大多数美国社会学家都可以认为是属于自然主义流派。但应该指出，在美国也有许多“范式”是反自然主义的，这些“范式”强调研究人类行动的意义和结果的重要性。许多社会理论家热烈拥抱发生在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折”，从而发生了走出实证主义的胜利大逃亡（罗蒂，Rorty,1967）。用哲学家彼德·温奇(P. Winch)的话来说，社会学解释不再是参照自然科学的规律来解释类似于为什么当冰块溶解时水并未溢出杯口的问题，^②而是用我们有关语言的知识来理解人们之间的会话（温奇，Winch,1958）。

最新的发展又产生了另一个转折。由于70年代末期，许多著名学者开始强调理论的整合或综合并重视开放与合作精神（参见亚历山大，Alexander,1982,1984；伯恩斯坦，Bernstein,1978；吉登斯，Giddens,1984；哈贝马斯，Habermas,1984；劳伯索，Loubser,1976；塞得曼，Seidman,1983；特纳和比格利，Turner and Beeghley,1981；华莱士，Wallace'1983）。因此，最近许多人正在试图通过超越各自为政的狭隘地方主义以及扩大理论的覆盖面而复活西方社会学理论。此外，从这种努力中又产生出了一种整合自然主义的因果阐释方法和反自然主义的解释学方法而减少二者之间对立的趋势（海斯，Hayes,1985）。这些因素标志着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一个新时期开始了，与此同时，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之间这场旷日持久的论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遗憾的是，我在本文中不能详细地描述这些最新发展。我想在本文结束前阐述一下我个人对这场论争的观点和看法。首先，我认为有必要重温一下西方社会学奠基者们——圣西门、孔德和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社会理论应该为社会生活的实践者们提供理解社会的钥匙。这样一种理论应该建立在合理与经验的调查的基础上。当然，它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简单地形成一些抽象和精致的命题以及从这些命题中推论出经验规则，而是要提供一种对现代社会的理解。这种理解一方面要根基于科学考察，另一方面要能为理性行动提供指导。^③那时候，孔德、圣西门和马克思提供的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与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分析结合在一起。^④只是到了19世纪当实证主义取得了长足发展和具有巨大影响之时，理解才开始与分析理论相分离。西方社会理论最近的趋势和发展就是试图在恢复理解的重要地位的同时将20世纪的主流分析派社会科学整合进来，而不是与之相对立（译者注：作者在行文中经常交替使用antinaturalistic、understand和interpretative三词来与naturalistic、explanation和analytic相对）。

① “范式”概念最先是由科学历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引入，这一概念对社会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参见库恩,1970:3—10)。库恩的研究启发许多当代社会学家去发展“后实证主义”和“后经验主义”社会学理论。在这些社会学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1982,1987)。

② 温奇举的例子是说明钟表怎样在机械原理的作用下运转，但它的正式结构还是和亨普尔的例子一模一样。

③ 参见米尔斯(1959)。

④ 对于今天我们大多数读者来说，他们理论中的理解一叙述的一面——对冲突、世界的分化与瓦解、工业化使家庭与工作发生分离的生动描述——比分析的一面来得更有力量。

其次，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帕森斯——这一当代最伟大的宏观理论家，事实上是骑墙于理解和说明这二者之间。在一本即将与读者见面的书中，我指出：帕森斯的许多研究实际上得益于和反映了他的宏观理论的理解的一面，即反自然主义的一面。例如，他把现代社会分为一个不断分化的文化系统、社会系统和人格系统；以及他对符号媒介如货币、权力、影响和承诺如何在这些系统之间流通和相互影响的分析；还有他对人类理性行为的不同类型以及非理性行为的基础的分析。凡此种种都反映了他对理解方法的使用。然而，当帕森斯在论战中分析宏观的一般理论的重要性时，他又使人们觉得他是一个忠实的实证主义方法的运用者。^①我在这里并不是想详细地解释帕森斯的观点，而只是想强调：直到最近，当宏观理论家们试图超越实证主义观点的局限时（如劳伯塞，Loubser,1976），他们很少阐明宏观理论中这种非实证主义因素的逻辑和认识论地位。理解的问题要么被完全忽视，要么，就被不同程度地归之为分析问题。最近的一些宏观理论家试图修改这一点并恢复社会理论中理解的一面（布朗，Brown,1989；埃德蒙森，Edmondson,1984；亚历山大，Alexander,1987；伯恩斯坦，Bernstein,1985）。

第三，正如法国哲学家和社会批判家让-弗朗索瓦·利约达（Jean-François Lyotard, 1984）指出的那样，分析科学（特别是它的实证主义的一面）的研究者们也不可避免地会使用理解一叙述的方法，而不管他们是否承认这一点。他指出了现代社会理论家中许许多多这方面的实例：如“精神辩证法、意义解释学、理性或劳动主体解放理论、财富创造理论”（the dialectic of spirit, the hermeneutics of meaning,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rational or working subject, and the thematizing of the creation of wealth）。即使是坚持科学的累积发展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具体成果之基础上的人也承认并部分地求助于叙述方法。用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的话来说都是理解和改造世界（古德曼，1978）。所以，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和非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差异并非是使不使用理解方法的问题，而是一个明确地承认使用理解方法，而另一个则否认并试图拒绝它。

最后，将明显的理解方法整合到主流社会学中产生了一个检验效度之标准的方法论难题。显然，在解释社会发展时，理解一叙述方法的作用不大，因为我们不需要小说和幻想。但是，叙述在某种意义上是“真”（true）而不是假，因此，它满足了正确性（rightness）这一跨学科标准（哈贝马斯，Habermas,1984）。有关证明（verification）的传统的实证主义标准不适合于上述这些目标。我个人认为，当今理论的一个紧迫问题就是建立合适的评价研究中理解一面的效度（validity）的标准。不仅如此，我认为检验理论中叙述的正确性的标准应该是长期讨论的结果，而不应该先验地确立。然而，这方面的实质性的讨论和工作几乎还没有开始（亚历山大，Alexander,1987）。本文的剩余部分想通过一个来自心理学的例子，尝试性地提出一个检验叙述的正确性的一个标准。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曾批判地分析了弗洛伊德的《忧伤与忧郁症》（“Mourning and Melancholia”）一文。弗洛伊德理论的要旨在于认为：由于失去重要亲人而产生的压抑症状导源于悲伤。受压抑的人，不是从失去一个不可复得的目标中释放利比多（libido），而是将这种利比多转为一种反现实的态度，从而固执地认为某一已经失去的东西本应该可以不失去……不是放弃这些东西，而是选择了追求这些东西而否定和抛弃他自身。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客体的影子总

^① 众所周知，帕森斯在他的《社会行动的建构》一书中批判了实证主义，但是他批判的对象是19世纪的进化论实证主义；这种批判实际上注入了20世纪后实证主义的许多因素。

是影响着本我；自我忍受着痛苦”（吉利根，Gilligan，1984:244）。

吉利根于是比较了弗洛伊德这一观点和后来英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的理论。后者研究儿童的痛苦，特别是研究那些失去双亲的儿童。和弗洛伊德不同，鲍尔比不是把分离(detachment)看作是一种悲伤的症状，而是将其视为病原上的压抑。

尽管弗洛伊德和鲍尔比两人同时强调追忆的重要性，但弗洛伊德是强调对失去亲人的回忆进而导致反现实态度，而鲍尔比强调的是对(失去之亲人的)爱的回忆，从而找到了表述它的途径(吉利根，Gilligan,1984:244—245)。弗洛伊德暗示只有把过去的希望和记忆的阴影放弃了以后，利比多才会找到发泄的途径，鲍尔比从一个不同于弗洛伊德的心理能量的模型出发，说明了与亲人永别所造成的悲伤和抑忧的过程必须加以修正，必须同时将它与获得新爱的能力联系起来。不能将感情和爱的故事描述为到此为止，而要将它描述为如何继续到现在(吉利根，Gilligan，1984:247)。

显然，这两种理论观点由于在理解—叙述方面的不同会对受它们影响的读者(或病人)产生不同的后果。我认为检验社会理论叙述方面的正确性的一个可行的标准就是要为它的读者——集体的或个人的——展示各种良性的可能性。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在谈及相关问题时使用了“虚拟化”(subjunctivizing)一词来概括由强调事实到强调创造新的可能性的转变。例如哈贝马斯在他的批判理论中使用了“日常世界的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lifeworld”)。这个术语就比默顿的“解释数据的一般取向”(“general orientation to the data”)或“广泛的解释框架”(“broad interpretative framework”)来得意义更大。后者还需要进一步转化为精确的可检验的命题。事实上，哈贝马斯的这一术语唤起了读者对压迫的本质以及缺少改变这种压迫的可能性的认识。这一术语的修辞学意义恰到好处而且提出了将来采取某种行动的可能性。我认为理论的修辞和改造世界的方面应该得到肯定和颂扬，而不应将其简单地归结为证明的和逻辑的问题。

对分析和描述作一对比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常将分析看作表面上是随意和武断的，而且我们也总是试图说明为什么它必须是这样的；与此同时，当我们试图建设理论的理解—描述一面时——描述的一面必须满足我们刚刚讨论过的正确性的标准——我们总是将其视为我们必要经验的一部分，而且试图说明它是偶然的、意外的和不确定的。事情在过去可能不一样，将来也同样可能不一样。一种好的社会学理论不能只是简单地说明事物是什么，而应该以一种能提出未来事物发展可能性的方式来陈述我们的集体经验。

五、结 论

正如一位当代美国作家琼·迪蒂翁(Joan Didion)说的：“我们总是自己给自己编故事，否则，我们就没法生活。”以马克思、孔德、杜尔凯姆和韦伯为代表的社会学理论开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讨论我们人类自身的生活。我们继承了这一活动以便满足人类理论和实践的需要。那些倾向于从自然主义或实证主义角度来理解社会科学的人通常以普遍规律(universal Law)来解释经验现象。与此相对照，那些倾向于从反自然主义或解释学角度来研究社会的人则通常试图理解和说明人类的行动和历史。最近，又出现了整合这二种倾向的趋势，这一趋势以批判理论家朱尔根·哈贝马斯为代表和先锋。这一趋势为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的论争注入了新的富有创造性的内容；它为我们人类提供了许多新的可能性，从而可能丰富我们人类生活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 Alexander, Jeffrey C.
1982 Positivism, Presuppositions, and Current Controvers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The 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Classical Thought; Talcott Pars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The Centrality of the Classics." In Social Theory Today, Eds., Anthony Giddens and Jonathan Turn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General Theory in the Postpositivist Mode: The 'Epistemological Dilemma' and the Search for Present Reason." In General Social Theory and Its Critics. Albany, N. 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Ben-David, Joseph
1973 "The State of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the Sociological Community: A Review Articl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5:448—472
- Bernstein, Richard J.
1978 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5 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Science, Hermeneutics, and Praxi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Blalock, Hubert M., Jr.
1969 Theory Construction; From Verbal to Mathematical Formu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 Brown, Richard Harvey
1989 (1977) A Poetic for Sociology; Towards a Logic of Discovery for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runer, J.S.
1986 Actual Minds, Possible World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Life As Narrative." Social Research 54:11—32.
- Coleman, James S.
1964 An 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 Edmondson, Ricca
1984 Rhetoric in Sociology. Boston: Salam House Publishers. Giddens, Anthony.
- Giddens, Anthony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lligan, Carol
1986 "Remapping the Moral Domain, New Images of the Self in Relationship." In Reconstructing Individualism; Autonomy, Individuality, and the Self in Western Tho-

- ught. Eds., Thomas C. Heller, Morton Sosna, and David E. Wellbe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odman, Nelson
1978 Ways of Worldmaking. Indianapolis, IN,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 Gouldner, Alvin W.
1980 The Two Marxisms: Contradictions and Anomal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athoff, Richard, ed.
1978 The Theory of Social Action: The Correspondence of Alfred Schutz and Talcott Parso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Habermas, Jürgen
1984 (1981)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I,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 Hayes, Adrian C.
1984 "Formal Model Building and Theoretical Interests in Sociology."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 10:325—341.
1985 "Causal and Interpretive Analysis in Sociology." Sociological Theory 3:1—10.
- Hempel, Carl H.
1959 "The Logic of Functional Analysis." In Symposium on Sociological Theory, Ed., L. Gros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Homans, George C.
1950 The Human Group.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1 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 Form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 Kuhn, Thoma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econd edition.
- Lin, Nan
1976 Foundations of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McGraw-Hill.
- Loubser, Jan J. et al., eds.
1976 Explorations in General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Free Press.
- Lyotard, Jean-Francois
1984 (1977)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artel, Martin U., and Adrian C. Hayes
1979 "Some New Directions for Action Theory." Sociological Inquiry 49:77—82.
- Merton, Robert K.
1949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67 On Theore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 Mill, John Stuart
1961 (1865) Auguste Comte and Positivism.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Mills, C. Wright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aisbett, John
 1988 Megatrends. New York: Warner Books.
- Parsons, Talcott
 1937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77 The Evolution of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 Parsons, Talcott and Edward A. Shils, eds.
 1951 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opper, Karl
 1957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Ritzer, George
 1975 Sociology: A Multiple Paradigm Science. New York: Allyn and Bacon.
- Rorty, Richard, ed.
 1967 Linguistic Turn: Recent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eidman, Steven
 1983 Liber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Social The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melser, Neil J.
 1968 Essays in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 Stinchcombe, Arthur L.
 1968 Constructing Social Theori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 Toffler, Alvin
 1984 (1980) The Third Wave. New York: Bantam Books.
- Turner, Jonathan E. and Leonard Beeghley
 1981 The Emergence of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Dousoy.
- Wallace, Walter L.
 1983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Sociology. New York: Aldine.
- Weber, Max
 1968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Ed.,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inch, Peter
 1958 The Idea of a Social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Von Wright, Georg Henrik
 1971 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Zetterberg, H. L.
 1954 On Theory and Verification in Sociology. New York: Almquist and Wiksell.

作者艾德里安 C·海斯(Adrian C. Hayes) 工作单位: 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社会学系

译者欧阳马田工作单位: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唐 军